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唐宋词流派史

VERSE SCHOOL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刘扬忠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唐宋词流派史

VERSE SCHOOL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刘扬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流派史/刘扬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04-5985-9

I. 唐… II. 刘… III. ①词(文学)—文学流派—研究—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流派—研究 IV. 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1163 号

选题策划 雁 声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29.5 插 页 2
字 数 497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文学评论》杂志 1997 年第 4 期刊登了我的一篇谈研究者之困惑的短文，题目叫《研究者要重视理论》。在这篇短文中，我从自己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近二十年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要想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研究者就必须加深理论修养，注重理论建构，拓展理论视野，以求在本学科的一些基本课题和本体理论层面上有所突破。

我的这些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所主要从事的词学研究工作。

词学研究原为传统诗学的一个分支。清代以前，这个分支小打小闹，一直没有多大的成就。清代词学大昌，在填词之风大盛的同时，评论、整理、研究历代词作的学术工作也蓬勃发展，遂使“词学”这项自宋亡之后沉晦了几百年的学问渐与诗学分了家，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专门之学。20世纪 20 年代以来，词学逐步现代化，更是成果累累，骎骎然变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词学的诸多成就早已人所共知，无须我来胪述；作为一个想在这个部门多做一些继往开来之事者，我倒是更多地看到了它的不足与缺陷。多年来，我在顺应这一部门的传统习惯进行作家作品研究和一般的风格、体式探讨的同时，对于有关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梳理。我的一些基本想法，已经形成了一篇长文，题为《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载《文学评论》1995 年第 4 期）。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看此文，当会对我的思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那篇文章中，我接触到了词学界长期论争而至今尚未解决、或尚未圆满解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其中就包括唐宋词流派的划分和论证的问题。我这样说道：“例如传统词论中很少有较为科学的关于风格、流派的系统论述，而只有一些印象式的、随意性很大而且又极为粗略的评点，以致几百年来论到宋词流派时，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和相关的概念范畴的贫乏，大多数论者只知搬用由明人张綖提出的‘豪放’、‘婉

约’二分法，把唐宋词削足适履地硬分为豪放、婉约两个流派，而且愈到现代，这两个所谓‘流派’愈被描述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一为词史主流，一为逆流等等。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激烈争论，至今未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其实现代词学家詹安泰早就尖锐地指出：以豪放、婉约二派论唐宋词，不过是论诗文的阳刚阴柔一套的翻版，任何文体都可通用，要真正说明唐宋词的风格流派，二派说未免简单化。詹先生主张按风格的差异将宋词流派细分为八派（参见詹安泰《宋词散论》）。当然，詹先生的主张和论述未必就是人人接受的定论。事实上在这类问题上也不可能出现定于一尊之论。不过这类意见的提出以及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至少是在启示和催促我们：立足于词史实际，运用科学的文学原理，总结历代关于风格流派问题的论述，尽快建构出词的风格学、流派学的理论。”

以上的简单追述，实际上已经大致说出了我撰写这部《唐宋词流派史》的动机、目的和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还要提到我的已故十一载的老师吴世昌先生，他在唐宋词流派问题上曾给予我很大的启示。吴先生于词学一道，力反前人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成说，主张独立思考，言前人之所未言，发前人之所未发，开创词学研究的新局面。他对“豪放”、“婉约”二派说早就极为不满，1979年他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包括我本人）讲授词学专题时就明确指出：豪、婉二派说“很不全面，不准确”，“无法包括全部宋词”（参见《我的学词经历》）。1983年，他发表了《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和《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两篇代表性论文，对传统词论提出挑战，坚决反对以豪、婉二派说硬套一部唐宋词史。先生的观点，引起了国内词学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有些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有些人部分地赞同他的意见；还有不少人完全不赞同他的意见，并发表文章进行了反驳和论辩。反对的意见之所以产生，除了各人所持学术观点大不相同之外，无可讳言地还因为吴先生的文章中对自己的意见一时未能阐发得十分周密，有些具体提法稍嫌过头，留下了可商榷的余地。但从总体上看，吴先生的新观点打破了以浅层次、粗线条的风格划分来代替科学的、细致深入的风格流派研究的沉闷局面，启发人们（包括我本人）对唐宋词的风格流派及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吴先生的观点，主要立足于破除前人成说，而尚未能得及“立”——全面地、系统地阐述关于唐宋词风格流派的若干重大问题，建立自己的唐宋词风格流派演变史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

系。1986年，吴先生突罹重病，遽归道山。我在哀悼老师之余，萌发了一个念头：在条件许可的时候撰写一部唐宋词流派史。我之所以有此打算，并不是要为80年代那场由吴先生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婉约”、“豪放”之争简单地画上句号，而是想在吴先生力破旧框框、锐意创新的治学精神启发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打开新局面。因此我在思考这一课题时并不想亦步亦趋地应合吴先生在词的风格流派问题上的每一个具体观点，而是从自己的主体意识出发，依据唐宋词发展的全部史实，来建构流派理论与流派史的体系。吴先生生前曾写过这样的治学格言：“虽尊师说，更爱真理。不立学派，但开风气。”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自己在这个研究课题上的打算是完全符合老师的追求真理的根本原则的。于是，大约在先师逝世三周年之际，“唐宋词流派研究”这个课题在我的大脑中轮廓粗就了。

90年代初，我正式将“唐宋词流派研究”这一课题列为了自己的主攻项目。这一项目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使我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鼓励，得以悉心搜集和研读资料，进而全力投入书稿的写作和修改。此中甘苦，一言难尽。我力图将此书写成一部以流派演变史为主的新型唐宋词史，因此不但要打破“豪放”、“婉约”二分法等传统词论，而且还要打破传统词史按时代先后连缀单个词人词作的框架，注重从时代风会、文人心理、词学观念、社会审美习尚等等发展演变的角度，来全景式地把握唐宋词流变的过程；要变作家个体研究为群体研究，使人们看到一部唐宋词史不仅是作家个体活动的历史，而且更是群体互动及各流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激烈竞争的历史；要着重考察唐宋时期哲学、政治、宗教、社会习俗、民族心理等，如何深刻地作用于不同的词人们，又如何影响不同的词人群的创作观念与审美情趣，以造成唐宋词风格与流派百花争妍、异彩纷呈的种种情况。本书并不想就唐宋词论唐宋词，而是尽力将研究的视境向广义的文化活动拓展，从横向与纵向都体现对历史文化运动的辩证观照，探寻当时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各个文化层面、各个文化部门与曲子词创作的有机联系，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说清唐宋词流派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

数载艰辛，初稿出来了，又几经修改，这部倾注了我的大量心血的《唐宋词流派史》终告完成。至于它是否已经大致达到了我预先设想的目标，是否在唐宋词流派研究这一特定领域比之前人有所开拓，有所进步，则请读者和同行细读全书之后作出判断。我今年已满五十一岁，正是在人

生道路上“知天命”的阶段完成了这部学术专著的。回顾五十一年的生命历程，觉得自己做过的许多事皆不足道，唯在做学问、追求真理的工作中多多少少实现了自我人生价值。先师吴世昌先生有诗云：“五十年来只此身，不求闻达不辞贫。一生愧我无珍藏，半字从君便失真。”这诗本是先师因友人来信误将其字“子臧”书成“子藏”而写的打趣之作，但其中亦显示了先生的性情怀抱。我自己德、才均平平不足道，但差堪告慰先师并聊以自慰的是，我大半生为人与为学，尚能以求真、求实为标准。这部力求真、求实的书稿，并未达到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不是我不想达到，而是我的才、学、识还不够。因此，这部书稿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唐宋词流派研究”这个课题的终结，更不意味着我的研究事业的终结。我将继续做下去，用我的生命和心血。

是为序。

刘扬忠 1997年7月大暑之日
于北京东郊寓所奋笔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总论：关于建构唐宋词流派史的理论思考和基本设想	(1)
第一节 文学流派在任何文学里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1)
第二节 历史的回顾之一：传统的“豪放”、“婉约”两分法	(4)
第三节 历史的回顾之二：自宋以来的诸家源流派别论	(16)
第四节 辨析唐宋词流派的理论标准和历史依据	(24)
第五节 唐宋词构体衍派的特殊背景及其大致流派类型	(28)
第二章 初显流派端倪的晚唐五代词	(38)
第一节 孕育词体文学的文化土壤	(38)
一、燕乐的特点与词的特殊风格	(39)
二、诗体之渐衰与词体之代兴	(41)
三、时尚之转变与晚唐诗风之渗透	(45)
第二节 审美时尚与“正宗”词风的代表者——“花间”派	(48)
一、“花间”派的形成及“花间”十八词人的个体与群体面貌	(49)
二、“花间”派的词体理论宣言——欧阳炯《花间集叙》	(58)
三、“花间”派奠定的“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基本格局	(64)
四、后代词派之滥觞——“花间”派内部风格歧异现象的解释	(70)
第三节 五代词坛另一派——南唐君臣词人群体	(76)
一、扬州—金陵；南国另一个文化中心和歌词创作基地	(78)
二、多才多艺的风流君臣与“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亡国心态	(82)

三、冯延巳：南唐词感伤主调的奠基者和新词境的开拓者	(88)
四、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李后主	(94)
第三章 宋代审美时尚及北宋前期雅俗二词派	(104)
第一节 宋初六十年词坛的沉寂及其主要原因	(105)
第二节 影响北宋词风格流派总体格局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	(109)
一、最高统治者倡导的士大夫歌舞享乐之风以及由此而来的 燕乐“新声”之盛	(109)
二、“独重女音”、“浅斟低唱”的音乐文学审美时尚	(114)
三、歌妓对于词的风格体貌形成的重要参与作用	(117)
四、时髦的都市文化与传统的士大夫意识之间的对立和 调和	(123)
第三节 宋词流派初分：晏欧台阁词风与柳永俚俗格调的对立	(134)
一、柳永的趋俗与晏殊的尚雅	(135)
二、尚雅与趋俗相对立的文化动因	(139)
第四节 以二晏一欧为骨干的北宋江西词派	(145)
一、江西词派名称的由来以及北宋江西词派范围的界定	(145)
二、晏殊的领袖地位和典范词风	(148)
三、与晏殊并驾齐驱的欧阳修以及其他同派词人	(155)
四、晏欧词风的强大后劲晏幾道	(162)
第五节 碌俗词派的开山祖——柳永	(165)
一、反传统的“柳耆卿体”：俗调俗情	(166)
二、“柳耆卿体”：对词体发展及词的艺术手法的大贡献	(174)
三、北宋中后期的柳派词人	(178)
第四章 新体新派迭起的北宋中后期词坛	(184)
第一节 东坡体——完整意义上的士大夫之词和诗人之词	(185)
一、“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及其实践	(186)
二、东坡体：“变体”何妨为大宗	(196)
三、苏轼词派的形成与衍变	(205)
第二节 折中于柳苏之间、另开浑雅典丽一派的周邦彦	(213)
一、“浅斟低唱”的颓靡时风与感伤低回的抒情词人	(213)
二、律精调雅、法密技新的清真词	(221)
三、“大晟词派”诸名家	(229)

第三节 北宋晚期的俳谐词派	(232)
一、俳谐词的来源及其盛行之因	(232)
二、风行于熙、丰至宣和年间的俳谐体与俳谐派	(238)
三、俳谐词派在南宋的余波及俳谐词衰落的历史教训	(243)
第四节 笃守“本色”而又各树一帜的三位婉约词名家	(248)
一、俊逸精妙的“张子野体”	(249)
二、清新婉约的“秦淮海体”	(253)
三、秾丽与雄奇兼备的“贺方回体”	(257)
第五章 两宋之交的词风巨变及南渡各词派	(263)
第一节 政治大变局与词风大转变	(263)
一、宋南渡的特殊性及其时间断限	(264)
二、“靖康之难”与东坡体之大盛	(266)
第二节 慷慨悲壮的英雄豪杰词派	(273)
一、民族英雄岳飞的“沥血之辞”	(274)
二、南渡四名臣的干预时政之词	(275)
三、张元幹、张孝祥的凛凛雄风	(280)
第三节 由感伤转入旷达的学苏派	(286)
一、“步趋苏堂”的叶梦得和向子諲	(287)
二、陈与义、吕本中等江西诗派词人	(292)
三、“多尘外之想”的朱敦儒	(297)
第四节 开径独行的女词人李清照	(300)
一、“别是一家”之说与婉约正宗之路	(301)
二、自是花中第一流	(305)
第五节 供奉词人群与隐逸词人群	(308)
一、混迹于宫廷的供奉词人群	(308)
二、遁迹于山林的隐逸词人群	(310)
第六章 代表南宋前期审美主潮的稼轩词派	(316)
第一节 辛弃疾：稼轩词派的主帅和灵魂	(316)
一、失意英雄的一生及其主体意识	(318)
二、以笔代剑的创作观与审美理想	(323)
三、高度个性化的稼轩体及其历史地位	(329)
第二节 稼轩词派的构成和发展	(336)

一、政治与文学的双重因缘——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审美	
情调	(337)
二、稼轩派第一健将陈亮	(342)
三、稼轩派第二健将刘过	(345)
四、稼轩派的同盟军韩元吉、陆游	(348)
第三节 南宋中后期的稼轩派词人	(354)
一、亲炙稼轩风的杨炎正、程珌、黄机、岳珂等人	(355)
二、应合稼轩风的戴复古、刘仙伦、刘学箕、崔与之、葛长庚 等人	(360)
三、南宋后期稼轩派主将刘克庄及其他同派词人	(366)
第七章 崇尚雅正和讲求词法的南宋中后期词坛及其主要流派	(374)
第一节 南宋中后期的文化环境与词派的衍变	(374)
一、偏安之局的凝定与时代风会的转移	(376)
二、复雅之风的劲吹与新旧词派的消长	(379)
第二节 清空骚雅的姜张词派	(385)
一、独树风雅大旗的姜夔	(386)
二、承白石衣钵的张辑、赵以夫、柴望	(393)
三、姜派最佳传人和理论家张炎	(396)
四、“得白石意度”的王沂孙等人	(402)
第三节 南宋中后期的学清真派	(406)
一、“清真之苗裔”史达祖	(407)
二、肩随史达祖的高观国、卢祖皋及宋末的周密等人	(412)
三、遍和清真词的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	(418)
第四节 丽密质实的梦窗词及其同派	(422)
一、吴文英的独特词风与审美倾向	(422)
二、梦窗派词人尹焕、翁元龙、黄孝迈、楼采、李彭老等	(428)
第五节 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	(433)
一、得名之由及流派范围	(433)
二、稼轩派在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期的遗响与变奏	(434)
三、江西词派的翘楚刘辰翁	(435)
四、江西词派名家文天祥、邓剡、罗志仁、黎廷瑞及 赵文昆仲	(438)

五、江西词派同盟军蒋捷、汪元量	(442)
结束语	(448)
校后记	(450)
主要参考书目	(451)

第一章 总论：关于建构唐宋词流派史的理论思考和基本设想

第一节 文学流派在任何文学里 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本书所要考察的，是古典诗歌样式之一的词在其黄金时期——唐末至宋末——流派衍生的概况。鉴于词学界对此问题有过许多争论，这里就先从文学流派的普遍性谈起。

文学史家在描述某一时代、某一领域或某一体裁文学创作高度成熟和繁荣的状况时，十之八九都爱使用一个比喻——百花园。比如说到唐诗，就称“唐诗的百花园”；说到宋词，就赞“宋词的百花园”。这似乎成了一种“陈辞滥调”，但在弄笔头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各种形容词语中，确乎只有“百花园”之喻最能映现文学艺术繁荣的事实——一花（或寥寥几种花）独放不是春，唯有群芳争妍，万紫千红，方能托现出文学艺术发展的满园春色。就其本质而言，所谓文学，无非就是用艺术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类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相对于创作的终极目标来说，人类的心灵世界有多丰富，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存在形式就该有多丰富。因此，文学史家在论证文学发展的这种多元特征时，也常喜欢引证先哲的这样一段名言：“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那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作为人类精神存在方式之一的文学，它的兴旺发达的确犹如百花园中众芳竞放，异彩纷呈。

而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常常表现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具体的创作领域，除了卓有成就的大家巨擘争相出现之外，更有众多标新立异的流派彼此并立或对立，形成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洋洋大观。研究者须兼顾

作家个人与文学流派的新陈代谢，才能把握文学发展的全貌。文学创作活动并非孤立个体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每一个作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前代、同代及后代作家发生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关系。同时代的作家互相结成群体关系，而不同时代但在艺术传统、审美追求和风格趋向上有关联的作家则形成代群关系。群体与代群关系不都是流派关系，但文学流派却一般都是从群体与代群关系中产生的。在文学活动中，作家个体与文学流派，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实体。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确有少数杰出作家和伟大作家，完全是依凭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成就而存在，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时期、一个领域或一个文体中的独立环节，他们并不以某一流派自限，或者并不一定能划归哪个流派。比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现代的鲁迅、巴金等，就是这样的独自处于一个阶段文学顶峰的人物。但是在更多、更广的场合，杰出的作家总是与他们的众多崇拜者和追随者一起，创作出一种具有类似风格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或紧密或松散、或有组织形式或仅仅声气相通的文学流派。这有如在自然界辽阔的陆地上，既有几座独立不倚、高耸云天之外的大山峰，但更多的是互相连结、蜿蜒不断的簇簇群峰，它们与那些大山峰或遥相对应，或奉其中的某座为主峰并与之联结在一起，按一定的走向组成纵横交错的一道道山脉。这又如在一片万紫千红的大花圃中，除了少数单株独放、高标出众的所谓“国色天香”之类的名花异卉以外，更有众多的以类相从、一畦畦一道道相连相倚地绽苞放蕾的自然花卉群落。不管是独立的大山峰与山脉，还是单株名花与自然花卉群落，它们的同生共处所反映的都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

以上的描述和比喻只是为了说明：文学流派作为一种基本文学现象，在任何文学里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种普遍的存在，文学研究者自近代以来逐渐将对文学流派的梳理和评论当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者已经懂得：流派是时代精神、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由于这种结晶并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优秀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若干作家群体身上，因而这种文学现象就更加富有探讨的意义和价值。研究文学流派，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基本的发展脉络，并发现或总结出文学史的某些规律和经验，不仅能指出同一历史时期内文学的横向的分化，而且也能看清前后不同时期文学的纵向的关联。尽管流派史远远不是文学史的全部，但它却无疑是

文学发展史中脉络最清楚、特点最鲜明的部分。开展流派史研究，可以把文学发展的主要过程及其流变的特点描述得较为准确，较为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做到比那些仅仅罗列与串联单个作家作品的旧文学史著作更加清晰简明和提纲挈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好些部门已经注意或加强了对于古代文学流派的研究。比如在唐诗学的领域，人们不但早就承认了唐诗高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流派的兴旺发达这个基本事实，而且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这些流派进行梳理和评价；不但有近于唐诗流派通史的一些专著问世，而且有更多的研究单个流派如田园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大历十才子、元白诗派、韩孟诗派等的专书问世或专题论文发表。唐诗流派史的框架，已经大致建构起来，流派研究作为唐诗学的一个分支已成气候。

可是，在词学界，对于号称“时代之文学”的唐宋词的流派问题，至今连在基本的理论把握上都尚未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建构唐宋词流派史了。晚唐五代两宋词，作为从公元9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晚期这四百多年间最富时代特色、最有艺术个性的文学，曾经高度繁荣，异彩纷呈，涌现过堪与唐诗、元曲的丰富性比美的众多风格和流派。对此理应有与其丰富复杂状态相称的研究、梳理和描述。遗憾的是，囿于前人传下来的某些陈旧、粗疏和不科学的词学理论及观念，我们的研究界对于唐宋词丰富复杂的风格流派现象十分漠视，把四百多年的漫长复杂的词体文学流变史简单化地、削足适履地归纳为所谓“豪放”与“婉约”两大派“对立”和“斗争”的历史。在许多研究者笔下，原本众芳争艳、风格流派纷呈的唐宋词大花园不见了，只剩下“豪放”、“婉约”两朵孤零零的花儿；群峰簇簇、山脉交错的唐宋词山国隐没了，只剩下“豪放”、“婉约”两座（或最多两列）山峰；涵汇万状、众水奔流的唐宋词海洋消失了，只剩下一清一浊的“豪放”、“婉约”两条河流！试问：这难道是唐宋词流派史的原貌吗？

本书之所以一开头就把“豪放”、“婉约”两分法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并不意味着前人运用这两个概念去粗略划分词体文学的基本类型风格的做法一无是处，更不是认为前人对于唐宋词风格流派的研究毫无成就，而是鉴于：人们曾经对这“两分法”作了极为浮浅和简单化的理解，用它来圈定了整部词史，取代了对于唐宋词风格流派本应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更有甚者，“两分法”的运用几百年来常常与词学史上

甚为风行的“正”与“变”的观念纠缠乃至融合在一起，陷入正统词学观念的圈子里，对若干历史现象及相关的作家作品作了错误的定位和歪曲的评价。倘若不对以“豪放”、“婉约”两体两派论为核心的旧风格流派论进行梳理和评判，就难以拨开历史的迷雾和找出建构唐宋词流派史的新路子。

第二节 历史的回顾之一：传统的 “豪放”、“婉约”两分法

艺术风格是划分流派的基础，因此本书对历史的回顾即以评述前人对唐宋词最基本的类型风格的辨识作为起点。

阳刚与阴柔，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习用的一对审美范畴，它们常常被用来粗略地划分和评价文学作品最基本的风格形态。古往今来，文学应时而变，因人而异，其风格形态的确纷繁万端；然撮其大要，不外乎刚、柔两大类，或曰刚、柔两种趋向。《文心雕龙》在谈文章的体性与风格时，从时代环境、作家禀赋气质与作品的关系着眼，多处论述了刚与柔的分立，指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文之任势，势有刚柔”；“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如此等等。这一对由《周易》首先提出的哲学概念，毕竟过于简单和抽象，不易反映出作为形象思维产品的文学的具体形态，于是自刘勰之后沿用“刚”、“柔”两分法的文论家们或多或少地陆续为之加进了一些形象性的阐释和具体描绘。就中当推清人姚鼐的体认和描述最为精彩传神。姚氏论文，力倡阳刚、阴柔之说，他指出：“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①这段形象化的文字，的确道出了阳刚（壮美）、阴柔（优美）两种美的不同特征。人生天地间，其禀赋气质有刚柔之分，“偏胜”（即有的人阳刚之气多一些，有的人则阴柔之气多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发而为文学作品，即相应地有阳刚、阴柔两大趋向，形成两种不同